

中国历史故事丛书

王小波李顺起义

辽宁人民出版社

王小波 李顺起义

红旗造船厂热处理车间历史研究组^编
辽宁师范学院政史系历史教研室

辽宁人民出版社

一九七六年·沈阳

北宋方腊起义

延之千里

*
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昆明市书林街100号)

云南新华印刷厂印刷 云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2\frac{3}{4}$ 插页: 1

1975年10月第一版 1975年10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30,400

统一书号: 11116·34 定价: 一角九分

毛主席语录

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

地主阶级对于农民的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迫使农民多次地举行起义，以反抗地主阶级的统治。……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因为每一次较大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结果，都打击了当时的封建统治，因而也就多少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王小波、李顺农民起义形势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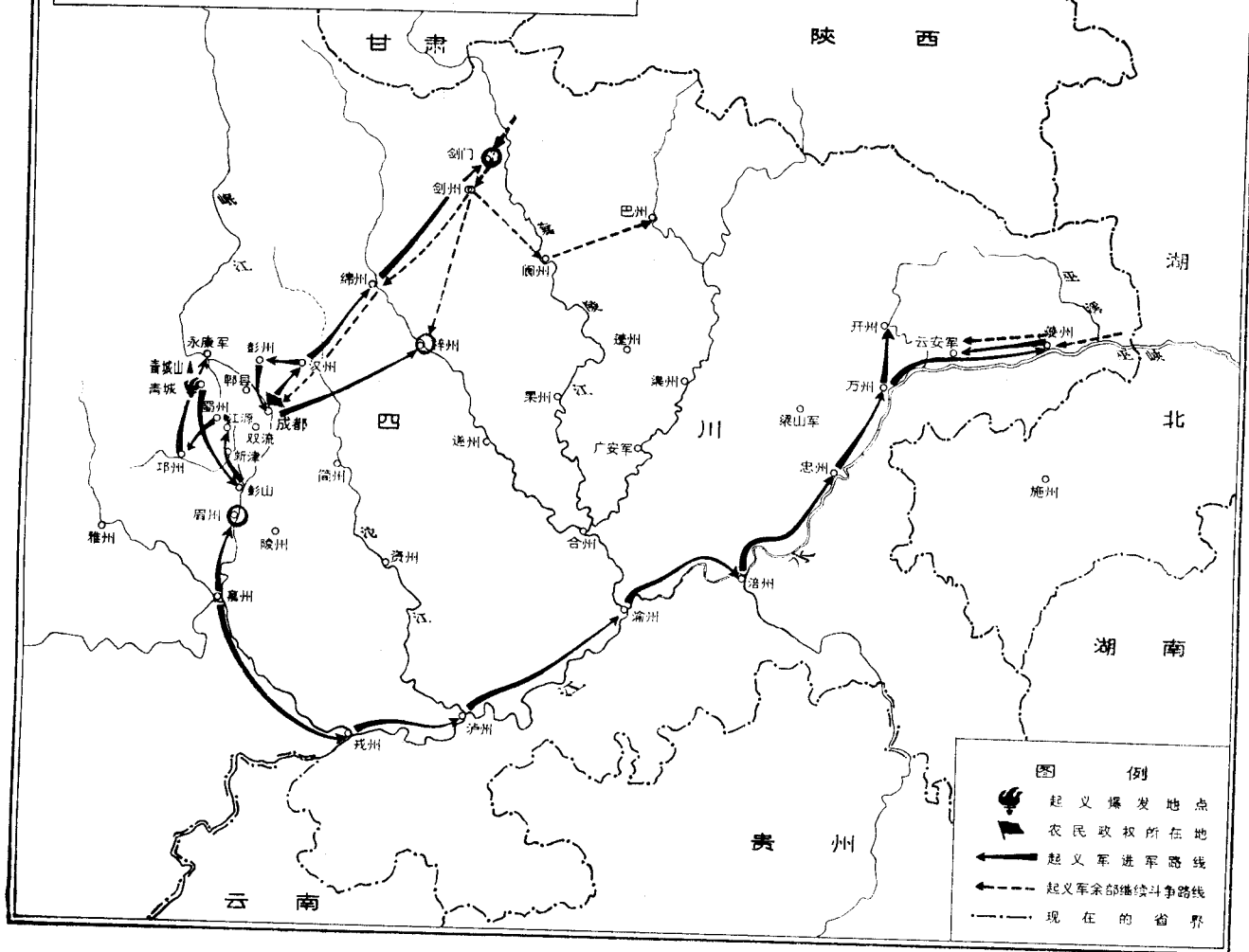


图 例

- ★ 起义爆发地点
- 农民政权所在地
- 起义军进军路线
- - - 起义军余部继续斗争路线
- 现在的省界

目 录

贫富悬殊	北宋腐朽.....	1
富人天国	穷人地狱.....	10
“均贫富”	青城起义.....	15
前仆后继	再接再厉.....	24
建立大蜀	历史丰碑.....	30
斗争不屈	虽败犹荣.....	35
有益借鉴	不朽功勋.....	43

公元九九三年，正值北宋封建王朝初期，在四川爆发了王小波、李顺领导的农民大起义。这次起义提出和实践了“均贫富”的革命理论和斗争纲领，坚决反对封建等级制度和土地制度，反对封建压迫和剥削，同时还建号称王，设置官吏，建立革命政权，显示了农民阶级反对皇帝，与封建朝廷誓不两立的革命壮志。这次起义以反“天命”的革命思想冲击了反动的孔孟之道，以坚定的斗争精神和果断的革命措施，坚持了农民起义的正确路线。这次农民起义意义重大、影响深远，它是中国农民战争史中光辉壮丽的篇章。

“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王小波、李顺起义的爆发，是以北宋皇帝为头子的地主阶级对农民和其他广大劳动人民进行极其残酷的剥削和压迫所引起的。

贫富悬殊 北宋腐朽

公元九六〇年，后周的禁军统帅赵匡胤发动兵

变，武装夺取了后周政权，建宋称帝，定都开封，历史上称为北宋。

宋太祖赵匡胤执政后，积极推行一条统一的路线。从九六三年出兵荆湖，到九七六年病死，南征北战十三年。其弟赵光义继位后，继续推行武力统一的事业。前后共用了二十几年的时间，才结束了唐代安史之乱以来二百余年的封建割据局面，重建了统一的封建中央集权。统一国家的出现并非只是由于赵氏兄弟的个人军事才干，而是决定于人心的向背，决定于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天下乱久”，民“厌乱久矣”，人民厌弃长期的封建割据混战，渴望国家统一。所以北宋实现“一统海内”，是顺应了历史发展趋势，符合人民安定、统一要求的进步事业。

一度强盛的唐王朝被唐末农民大起义所推翻，农民战争中封建生产关系得到了某些改造。中国南北统一，解除了由于封建割据和军阀混战造成的严重破坏，广大劳动人民可以在比较安定的条件下从事生产，社会经济得到了逐步恢复和发展。北宋时，南北农村实行多种种植和推广新品种，由越南传入的占城稻，原来仅在福建种植，北宋时这个“不择地而生”的新稻种，已在江淮一带推广。长江下游农民“筑土

作围以浇田”，使农业有了发展。农业发展带动手工业的发展。手工业中，又以矿冶、造船、丝织、制瓷著称。唐初有矿一百八十六处，北宋中叶已发展到二百七十一处。北宋瓷器，亦较唐代进步，北宋除定窑、汝窑、官窑、哥窑、钧窑，五大名窑外，江西景德镇也逐渐驰名，产品远销日本、朝鲜、南洋和中亚的叙利亚、埃及各国。宋代造船，亦世界首指，当时中外商人用船大都是中国制做的。中国海船体大底尖，速度快，船稳安全。至于宋代指南针发明使用，则更是勤劳、智慧的中国人民的伟大创造力的证明。

但是，在阶级社会里，“生产的每一进步，同时也是被压迫阶级即大多数人的生活状况的一个退步。”中国社会发展到北宋，已经是封建社会走下坡路时期，地主阶级根本利益的要求，使得赵匡胤在取得政权后明显地出现从尊法反儒到尊儒反法的蜕变，他坐上皇帝座位不到一个月，就“命葺修先圣庙，并励武人读书”，以后又提出“作相须读书人”，进而“大重儒者”，开始把儒家思想用为维护封建统治，欺骗人民的重要工具。宋太宗赵光义还信奉道教，大度僧、尼、道士，极力贩卖唯心主义，大搞宗教迷信，妄图用神权和天命观来愚弄和麻痹劳动人民，幻想使赵宋

王朝长存久安。北宋皇帝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根据儒家学说制定了“安内以攘外”的对外屈辱求和、对内镇压人民反抗斗争的路线。这样就更加激化了农民和地主之间的阶级矛盾。

北宋建国初，存在着数量极多的无主荒地，国家直接霸占这些土地称为官田。宋太祖赵匡胤为了巩固封建统治，就采用“分封”、“御赏”的办法，将大量的官田赏赐给“功臣宿将”，鼓励部将们“释去兵权，择便好田宅市之，为子孙立永久之业”。同时，皇帝为了取得官僚地主阶级的支持，达到“富室连田阡陌，为国守财尔”的目的，便采取了“田制不立”、“不抑兼并”的鼓励政策。由于有封建政权撑腰，所以官僚地主就有恃无恐地热衷于土地兼并。当时以“清廉”闻名的宰相赵普带头“广置田宅，经营邸商，侵夺民利”。上行下效，官僚权贵、地主豪强、富商大贾们，纷纷利用他们的政治特权和经济优势，鲸吞土地。结果一户地主往往拥有土地几十万以至几百万亩。例如宋太宗时，大官僚楚昭辅做枢密使，任职期间所得赏赐达亿万之多，罢官以后，全部用来购买“上好田宅”，成为全国有名的特大地主。土地兼并，必然造成贫富悬殊，到了宋太宗时期（公

元九七六——九九七年），就呈现出“富者有弥望之田，贫者无卓锥之地。有力者无田可种，有田者无力可耕”的贫富悬殊的局面。

北宋最高统治者为了提高皇权，加强封建专制主义统治，镇压劳动人民的反抗，便肆意扩充官僚机构和官吏名额，形成了庞大的国家机器。当时有人形容官吏之多犹如江河之中的鱼群一样。在咸平四年（公元一〇〇四年），有人建议一次削减冗官竟达十九万五千多人，加上留位的官吏，总数更多。那时作京官的除每年规定的俸禄外，所有家庭日用品都由官府供给。以宰相为例，每月俸钱为三百千（可置良田一百多亩），冬夏两季绫各二十匹、绢三十匹、绵百两、米粟每月一百石，其仆役从人的费用，也都由官府供给。外任官（地方官）有职田（多者达四十顷），有公用钱、茶汤钱。官吏退休，还有许多特殊待遇。同时皇帝还对大官僚不断进行“恩赐”，如宋太宗一次便赐给齐王廷美绢一万匹、钱五百万。除了高薪和恩赐外，还推行一种“恩荫”制度，即一人做官，三亲六故都可以捞个一官半职，就连还在骑着竹马玩的小孩子，往往因为“恩荫”也在得官受禄了。真可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这些家伙高高在上，“锦

衣玉食”，一生享用不尽，是一群紧紧叮在劳动人民身上的吸血虫。

北宋统治者鉴于历代封建王朝覆灭的历史教训，慑于农民起义的威力，极力加强镇压人民的军队。北宋建国不久就实行了募兵制，每当灾荒年景，大量招募饥饿的农民来扩充军队，妄图达到“凶年饥岁，则有叛民而无叛兵”，“收国内犷悍之徒以卫良民（地主）”的罪恶目的。这样北宋养兵越来越多，在开国初仅有军队二十余万人，到了太宗至道年间（公元九九五——九九七年）竟猛增三倍，全国军队人数近七十万。宋初统治者认为“国家若无外忧，必有内患。外忧不过边事，皆可预为之防；惟奸邪无状，若为内患，深为可惧。”因此把“守内虚外”作为北宋封建王朝的传统国策定下来，对辽和西夏两个少数民族贵族政权的侵扰，毫无斗志，采取妥协退让方针。北宋搞这么多的官兵主要是用来对内防范和镇压人民的。

土地兼并，贫富悬殊。不到北宋中期，全国百分之七十左右的土地归地主阶级所占有，而其中良田沃土又为统治阶级上层所窃取。占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广大农民，仅有约占百分之三十的土地。广大农民不但要遭受地主的地租和高利贷盘剥，而且要负

担北宋王朝的各种赋税，被迫从事无偿的劳役以养活大批的官吏和军队。官府赋税剥削繁重，国家赋税主要的有“两税”和“丁赋”。

两税是每年分作夏秋两季农民向官府交纳田赋粮。名义上是凡拥有土地的人家都应交两税，但事实上有财有势的官僚地主可凭借特权不纳或少纳，而中小地主即使纳税也是从佃户和半自耕农身上榨取，并且地主总是用各种手段把田税直接转嫁到自耕农和半自耕农身上。所以少地、无地的自耕农、半自耕农和广大佃户却负担了国家的全部田税。

丁赋就是人口税，是农民一项极为沉重的负担。北宋朝廷规定男子二十岁以上至六十岁以下为丁口，一家有几个丁男，就要向政府交纳几份丁赋。每丁每年要向官府纳钱一千四百文、绢八尺。逼使农民只得出卖粮食来交丁赋，但北宋时期粮食贱价时，每斗只值七、八文铜钱，那末要凑足一千四百文，非得倾家荡产，卖妻鬻子不可，此外别无它路。

为了更多地榨取人民的血汗，北宋官府还在赋税验收上玩弄了很多花样，有所谓“折变”、“支移”、“和买”、“科配”等。

折变即民户本应交粮食，但官府却强迫进行不等

价的“以麦折钱”、“以钱折绢”，这样几经折变后，实际交纳的要比原来应交的不知要高出多少倍，更加重了人民的负担。支移就是根据官府的需要，硬逼民户“移此输彼”、“移近输远”，为此广大农民只得背井离乡，长途跋涉，“往返千里，耗费十倍”。和买是北宋官府压价向农民收购粮米，按低于市价标准强行农民如期交纳，实际与掠夺无异。科配则是官府随心所欲“随时摊派”。

除繁重赋税外，还有苛刻徭役（也叫差役或职役）。宋代徭役名目很多，主要有衙前（运送官物，看守仓库等）、乡书手（督催赋税）、壮丁（地主阶级用于对付人民反抗斗争）等。由于官僚、商人、寺观、地主等都不服差役，因此自然又落在自耕农和半自耕农身上。服差役就失去了主要劳动力，不仅影响了生产，还要赔偿财物损失，代垫赋税等，这也是人民一项沉重负担。

由于北宋封建势力残酷的剥削和压迫，激起广大农民愤懑和反抗。为了维护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压榨和剥削，北宋封建国家在法律上明文规定，客户（佃户）比主户（地主）低一等，地主打死佃户判刑很轻，甚至赦免无罪；反之，佃户侵犯地主利益，就要

罪加一等，严惩不贷。又为了防止农民逃亡，保证封建剥削所得，责令百姓十家为一保，相互监督。若有逃亡者，其赋役就由其他九户来分摊。有时，县吏如狼似虎直接闯入逃亡者的家中，“检其资财，至于室庐什器，桑枣材木，咸计其值”，名为作逃亡户赋税的抵偿，实同强盗抢掠。农民们“衣食不给”、“典桑卖牛，十闻六七”，挣扎于水深火热之中。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农民阶级不满贫富悬殊的现实，难以忍受地主阶级的残暴压榨，纷纷揭竿而起，武装起义接连不断地爆发。如：

公元九六六年，阆（音浪 lǎng）州（今四川阆中）爆发了农民起义，围攻州城，打击北宋的黑暗统治。

公元九七三年，蓬（今四川营山）、渝、涪（今四川涪陵）等州，农民领袖李仙率领万人以宗教形式举行了武装起义，“劫掠军界”，很多人起来响应。

公元九八一年，绵州（今四川绵阳）王禧等人以宗教形式率众起义。

公元九九三年，陈（今河南淮阳），颍（今安徽阜阳）、宋（今河南商丘）等州，普遍地爆发了农民起义，使北宋朝廷感到惶恐不安。

尽管这些小规模农民起义遭到北宋统治者的血腥镇压，先后失败了。但“山雨欲来风满楼”，这预示着一场农民大起义的暴风骤雨即将来临。

富人天国 穷人地狱

在贫富悬殊，社会腐朽的北宋，四川是一个阶级矛盾尤为尖锐的地方。

四川，古称巴蜀，也叫两川，宋代则分为川、峡两路，四周高山环绕，北部崇山峻岭，地势险要，通过“天险”剑门关，可抵陕西汉中；东出长江三峡，可与中原地区发生联系。因地处偏僻加上封建自然经济的特点，使得四川长期以来是一个比较闭塞的地区。唐末农民大起义，从中原到江南，横扫大半个中国，但没有进入四川，而唐僖宗曾经率领大批门阀贵族狼狈逃窜到蜀中。到了五代时期，唐代的“衣冠之族多避乱在蜀”。因此这里的封建势力，没有受到唐末农民革命的打击，反动气焰十分嚣张。这种情况宋初并没有什么变化。四川成了全国阶级矛盾最为突出的地区。以成都为中心的四川盆地，土质肥沃，又有都江堰灌溉之利，所以物产丰富，盛产稻米、茶叶、

丝、麻等，向有“天府之国”的声誉。但这个“天府”却不是广大农民的。地主骄奢淫逸，农民在痛苦呻吟。巴蜀两川虽然富饶美丽，然而在封建王朝的统治下，它只能是富人的天国、穷人的地狱。

四川这一地区在五代时期，被王建的前蜀和孟知祥的后蜀政权前后割据达五十余年，人民所受的压迫是极其残酷的。在前蜀王衍（王建的儿子）统治时，公开下令卖官，每一官职，谁出钱多，谁就可把官位搞到手，当官之后，就是贪赃枉法，借机大捞一把，弄得“人不堪命”。到了后蜀孟昶（孟知祥的儿子）统治时期，情况更坏，他的将相大臣，不仅“务广田宅，夺人良田”，甚至于“发人坟墓”，连死人也不放过。孟昶更是穷奢极欲，尽其享乐腐化之能事，连尿壶都用珍宝装成。后蜀官府横征暴敛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即使农民出嫁女儿的嫁妆也都要计数征税。加上土地高度集中，生产关系落后，弄得四川地区民不聊生，因此深刻的阶级矛盾由来已久。

自五代以来，以四川为首的南方几个经济发达的地区，成了关系全国经济收入的重要地区。北宋统一南方后，较快解除了五代十国割据混战时期中原财政枯竭的现象，也使得北宋政权的巩固获得物质保证。